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的舆论动员和战时宣传

——以随军摄影师龟井兹明为个案

马步云 邢永凤

摘要: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日本进行了广泛的舆论动员与战时宣传。受外部刺激和内部驱动,龟井兹明提出了成为随军摄影师的申请,跟从日本侵略军两次来华。龟井的申请迎合了日本舆论宣传的需要,日本官方和媒体也合谋将伯爵随军这一事件打造成用于战时宣传的热点话题。必须指出的是,甲午战争是日本蓄谋发动的对华侵略战争,龟井随军不是其自认为和日方宣传的“正义”之举,无疑是扮演了侵略者的仆从和帮凶。

关键词: 龟井兹明; 甲午战争; 舆论动员; 战时宣传

作者简介: 马步云,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济南,250100; 邢永凤,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济南,250100

DOI:10.13740/b.cnki.jiiohr.2017.03.002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政府高度重视舆论宣传,以拉拢和利用国际舆论,煽动国内民众支持和参与对外扩张。属于日本特权贵族阶层的伯爵龟井兹明作为随军摄影师跟从侵华日军两次来华,留下了数十万字随军日记和两百余张战地照片。因其作为这场战争的亲历者,加之身份地位的特殊性,龟井也受到了国内史学界的关注,不仅随军日记被翻译出版,而且其记录作为研究甲午战争的原始资料,也多见于军事史与地方史的研究之中,尤其是龟井记录下了其目睹的旅顺大屠杀的场面,在无意间供述了日本侵略军的残酷暴行,为日本的侵华罪行增添了“血证”。学界对龟井随军这一事件本身的考察尚不充分。龟井为什么会自愿随军,他的申请为什么会被官方批准,各大报纸又是如何报道龟井随军这一事件的,本文拟围绕上述问题做一探讨。

一、官方管控下的战争报道和民众动员

报纸是战争的“第一号俘虏”。^[1]战争爆发后,福泽谕吉、德富苏峰、内村鉴三等日本意见领袖将

甲午战争美化为“文明对野蛮的战争”,把对外侵略粉饰成“正义之战”。媒体与官方迅速形成并保持了对这场战争的同调性态度,各大报社随着战事的进展大肆鼓噪宣传,又纷纷派出随军记者跟从日本侵略军到前线战场采访报道。据统计,1894年7月至1895年11月,日本66家报社共计派出记者114名、摄影师4名;1894年7月至1895年7月,还有随军的画师11人在战场绘制战争场面。^[2]日军大本营为了管制随军人员,制定了详细的规定,并实行严苛的新闻检查制度,监控国内媒体的报道,主导战时的舆论动向。

在官方的严格管控和新闻媒体的配合下,日本社会旋即陷入空前的战争狂热。在日本政府做出向朝鲜派兵的决定后,日本各地一度纷纷组织所谓的“义勇军”,甚至形成了全国性的“义勇军运动”。然而明治政府不允许其直接参与战争,因为“义勇军”是民间组织的“军队”,且有旧幕府势力参与其中。政府起初试图通过警察系统阻止“义勇军运

动”的蔓延,但收效甚微。在宣战诏书公布一周后的8月7日,明治天皇又以一纸诏书解散了“义勇军运动”。在诏书中天皇赞扬了臣民的忠良爱国之情,但要求民众应效力于各自的“常业”,这也宣告了这一运动的中止。^[3]这一所谓的“义勇军运动”既反映了当时日本国内的战争狂热,也体现出明治政府在民众动员中的绝对主导性。“义勇军”的解散并没有减退日本民众参与战争的“热情”,在官方的组织动员下,许多平民争做随军的军夫。军夫是指作为临时人员受雇于军队的平民,在 frontline 战场上主要担负武器及物资的搬运工作,据日本军方统计,共计153 974名军夫参与了甲午战事。^[4]

此外,日本社会还掀起了所谓的捐资捐物运动,各大报纸又纷纷参与报道。其中,1894年8月10日,《读卖新闻》报道的一个大阪的贫民家庭的“捐款美谈”成为舆论焦点。该报道声称,在某穷人进行捐款时,旁人看其不像是有捐资余力的样子,便问为什么要捐款,该贫民回答道:我虽然贫穷,但也是国民的一员,这辈子也想着要为国报效、向天皇报恩,就把每日辛苦积攒的三元钱捐了出来,另外的两元本打算给孩子买衣服,但孩子说不要衣服要捐钱,便把这两元也捐了出来。^[5]这则“战时美谈”存在多少夸大或虚构的成分不得而知,但从中可窥出报纸为了逐利,既要迎合政府的宣传意图,又在不断地煽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鼓吹所谓的爱国心和牺牲精神。随着战事的进展,日军大本营移至广岛,明治天皇也随之而来,这一举动更是引来了日本社会对战争更为广泛的支持和参与。甚至有日本学者认为,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舍命”的民间运动,才使甲午战争上升为举国一致的水平。^[6]

二、受外部刺激与内部驱动的随军决定

龟井兹明(1861—1896),原名堤龟麿,生于日本京都,其生父为公卿贵族堤哲长,后被津和野藩藩主龟井兹监收为养子,改名兹明,凭借其养父在明治维新中的功勋,被授予伯爵爵位。龟井成长于日本全面学习西方的明治时期,曾留学欧洲多年,接受了近代西方文明的洗礼,痴迷西洋艺术,对摄影抱有极大的兴趣。留学期间,他节衣缩食耗费巨资购买了大量相关书籍,返日时带回包括书籍、油画、写真等各类文献约16 000余件,花费总额约10万日元,而当时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年薪也不过1

万日元左右,足见其对艺术的痴迷。龟井死后,其中部分书籍捐赠给东京大学图书馆,设立龟井文库。龟井的庞大收藏涵盖了绘画、设计、染织等多个领域,也吸引了日本国内众多关注的目光。可以说,在近代日本艺术史及日欧文化交流史上,龟井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在龟井身上,封建的忠孝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在其个人经历与行动选择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保持着一以贯之的效忠天皇的强烈意识。龟井的尊皇意识、报国观念产生于日本近代天皇制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之中,既受本国传统忠孝观念的影响,也受到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浸染。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体制,明治宪法以法律形式规定了天皇的最高统治地位。近代天皇制具有神政、家长式、立宪主义的特征,其实质,则是以立宪为外表,神政和家长式为内核的政治体制。^[7]甲午战争爆发之际,近代日本的国家体制已然完备。加之从明治政府成立之初,侵略扩张的野心便开始形成并逐渐膨胀,以“征韩论”为代表的对外强硬立场也不可避免地对包括龟井在内的日本民众产生了深刻影响。

如前所述,在官方主导的舆论宣传下,日本国内立即陷入战争的疯狂。受国内舆论宣传的鼓惑和刺激,出身于“华胄之家”的龟井虽然自认“不惯武技”,但为了“承家祖之余光”,立即决定自愿随军以图“报效”。^[8]中日之间的战争使龟井移情式地回忆起其所谓的“家祖余光”,家族史是促使龟井随军的重要内驱因素。龟井口中所称的龟井氏“家祖”,名为兹矩(1557—1612),初为战国大名尼子氏的家臣,后侍奉丰臣秀吉。秀吉死后,又转投德川氏,关原之战时隶属于德川家康一方,因功绩被封为因幡国鹿野藩的初代藩主。兹矩死后,其子政矩于1618年被改封至石见国津和野藩,是为津和野藩首任藩主,后延续11代,直至1871年明治政府废藩置县为止,津和野藩最后一任藩主即龟井兹明的养父兹监。

龟井兹矩对东亚大陆夙有野心,不仅曾听命于丰臣秀吉,直接参与过明末旨在占领朝鲜入侵中国的壬辰倭乱,而且在家康治世时,为了从朱印船贸易中获利而计划自主建造大型船舶以往来东亚海域。祖先的“征伐伟业”和“海外志向”作为家族记忆世代相传,也内化于龟井兹明的意识之中。置身

于日本国内狂热的战争氛围中,受到外部刺激的龟井不禁开始回忆兹矩的“武勇传”,渴望继承、延续祖先“未竟的事业”,甚至认为甲午战争的爆发使自己“遭逢隆运”。他声称“我家祖龟井武藏守兹矩,夙抱外征之大志,丰臣太阁欲赏其军功,问其所望,兹矩答曰,请以琉球国相赐,太阁壮之,亲执笔,于团扇手书‘龟井琉球守殿’六字,予以相赠,而后与太阁往来简牍皆署‘龟井琉球守’或‘龟井台州守’,盖因彼时视琉球与台湾为一,及文禄之役起,与诸将俱进朝鲜,立有殊功,今兹与清国交兵,琉球朝鲜事端起,我生于华胄之家,承家祖之余光,虽非军籍之身,又岂能不图报效,暗自揣摩,故申请从军。”^[9]

从明末到清末、从壬辰倭乱到甲午战争,绵延了300余年的家族史在龟井的脑海里应时对景般地显现,祖先的记忆随着汹涌的舆论喧嚣而愈发清晰。在外部刺激和内部驱动下,龟井做出了随军的决定。龟井自忖,作为随军摄影师参与中日战事,把摄影技术用于战争记录,既能作为军事的参考,为战史的编撰提供资料,还能为摄影正名,使自己“留名青史”。由于技术的不成熟和过高的成本,摄影在当时并不被人重视,龟井对此表示了不满“世人将其轻视为玩耍的道具,甚至轻薄之徒把其看作谋利之用,使人不胜愤慨。”^[10]在结束第一次随军回到日本后,龟井在大日本摄影评议会上大谈战地摄影的意义“我不顾自己才疏学浅,以个人的志愿而从军,研究摄影的技术,可是所失甚多,所得甚少,如今不胜遗憾,而在枪林弹雨之中,拍摄战斗的实况,实为以此次征清军为起始,(中略)我以微力从事这种工作,可说徒劳,其成绩很小,难以满足军人所期望的万分之一,殊感惭愧,然而对于器材的制作装置以及拍照的记述方面,也多少有些心得,(中略)照相班所拍照片,将肯定成为光荣的历史,作为英雄豪杰的纪念。因此摄影技术为军中所需,天下后世还有谁人能够怀疑呢?”^[11]

于是,龟井在7月28日向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8月7日向参谋次长川上操六,短时间内连续两次向军方递交了随军的申请。^[12]在申请书中,龟井表示一切费用自理,甚至宣称即使散尽家财也要从军。^[13]之后,龟井跟从侵略军两次来华,第一次隶属第二军第一师团司令部,10月16日从广岛乘船出发,10月24日在我国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至1895

年1月2日回国前,龟井一行留在中国境内。后因为需要修理器材和购置物品,龟井等人于1月3日乘船返日,1月7日到达宇品港,至4月14日待在日本。4月15日,龟井改随近卫师团前往中国,4月21日抵达我国大连湾,后滞留中国至5月19日。5月24日,龟井返回广岛,结束了第二次的随军行程。

三、伯爵随军:战时宣传的需要和话题

日本大本营批准了龟井兹明的随军申请,使其“报国有门”。但是必须指出的是,龟井随军本身在军事层面上罕有实际价值。虽然龟井声称要将当时最新的摄影技术用于战场拍摄,可供军事参考,但是一来照片的形式相对超前,在当时并非不可或缺,二来军方专业从军写真班的存在也保证了新兴技术手段在战争记录上的实际应用,拍摄的照片足够作为战史的资料参考。

此外,身份显赫的伯爵身赴枪林弹雨的战场险境,也不同于一般的民间随军人员,既有随行人员数名,还携带沉重的器材与行李,军方在军夫的配备及出行食宿的安排上也不得不为其提供相当的优待。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结束第一次随军行程返日后的龟井听从军方指派,改随近卫师团第二次来华前,“希望如从军第一师团一样对待”,^[14]然而在与近卫师团初步交涉后得知只能“与其他神官僧侣、新闻记者享受同等待遇”,便感到失望和不满,打起来了退堂鼓,甚至“越发坚定了放弃从军的决心”。^[15]可见,龟井即使是自费、自愿随军,也有一定的前提条件,即要求官方相应地为其一行提供方便和照顾。这不禁使人追问,日军大本营是出于何种考量,特批其随军申请的呢?

这是因为龟井的申请迎合了日本官方主导的舆论宣传的意图和需要,将龟井“随军报国”这一事件打造成为用于战时宣传的“典型”话题可以继续鼓动国内民众包括社会上层阶级支持对外战争。如前所述,战争期间日本国内实行了严格的新闻检阅制度,在官方的规制与统合之下,新闻报道里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武勇传”,整个日本社会泛滥着“日清战争”的消息。伯爵摄影师自愿“报国”随军,一切费用自理,在前线战场拍下数百张战地照片,印刷成册后将献给天皇御览。消息一经传出,立即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在战时日本的各大报纸中,“伯爵随军”的相关

报道屡有出现。1894年11月1日,《时事新报》报道了龟井携带照相器材随军出征并已抵达辽东半岛的新闻,并称赞龟井“欲以照片记录战场实况,将我‘义战’(引号为笔者所加)向世界介绍,使之广播天下”。^[16]1895年1月11日,《每日新闻》刊登了龟井返回日本的消息,在报道中对龟井大加赞赏,称其“在枪林弹雨中,饱尝许多辛酸,回国后将把在战场拍摄的实况冲印整理,不日献于大本营”。^[17]《报知新闻》1月17日以“非军人非军属的华胄界贵公子、驰骋战场随军摄影——在写真技术发展历史上值得记载的龟井兹明伯爵”为题发表长篇评论文章,详细介绍了龟井的经历,赞扬龟井“身非军籍,不惧危难,以军事之外裨益军国,如伯爵者天下能有几人”,在采访中,龟井详述了在辽东战场遭遇的严寒,称“不论穿多厚都不堪忍受,寒风几乎能把耳朵冻掉”,又提到旅顺战役时,自己想要近距离拍摄战斗场面,但因为“携带的摄影器材沉重,难以自如地跋山涉水”,只能远远地拍摄,感到非常“遗憾”,甚至笑言“彼我战斗力过于悬殊,战斗总是立即结束,虽然对我国来讲值得庆祝,但为了自己拍摄战斗场面,要是时间能够稍微延长一些就好了。”^[18]除了龟井本人以外,甚至龟井的随行人员也在报纸上大谈“随军故事”。1895年1月18日,《报知新闻》登载了龟井的仆从、桥本文三的“从军谈”。在采访中,桥本为读者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被俘清朝军人的怯懦无能和胆小怕死,感慨称“几万将士里能成事的是微乎其微”。^[19]

日本国内报纸通过对伯爵随军事件的集中和持续性报道,使普通民众获知社会上层人物也在深度参与这场战争,提高了国民对国家体制的认同感和整个社会的战争参与程度。不仅如此,相关报道大肆赞扬龟井不畏危险,又借龟井等人之口夸耀日军英勇无敌,贬斥中国军队不堪一击、清军士兵贪生怕死,使本就置身战争狂热氛围中的日本民众更加敌视、蔑视中国。在官方主导的舆论动员之下,龟井提出了随军的申请,其本人被日本官方和媒体联手打造成为用于战时宣传的热点话题和政治符号,连同其他充斥于新闻里的、或真或假的“典型”人物与事件一起汇聚成受到日本官方严格管控下的舆论洪流。日本政府高度重视战争话语体系的建构,为其对外侵略披上合法的外衣,“文明对野

蛮”二元对立的战争观和中国观深入日本社会,也使日本民众形成了支持侵略、蔑视中国的情感认知和意见共识。

四、结论:对美化侵略谬行的历史反讽与审判

甲午战争爆发以后,日本政府和舆论界将这场对外侵略战争断言为“义战”“文野之战”,经过大众传媒工具的不断重复,最终使民众将其作为得到证实的真理接受下来,形成了所谓的流行意见,强大的传染过程便于此启动。用观念和信念影响群体头脑时,所谓断言、重复、传染的动员手段虽然作用有些缓慢,但一旦生效,却有持久的效果。^[20]在舆论的煽动和蛊惑下,日本民众间接或直接地参与战事,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使爱国主义充满暴戾而变了性质。战地摄影是“报国”的方式,争做军夫、捐款捐物、志愿服务等等都是“报国”的手段。龟井顺应了日本舆论宣传中制造热点话题的需要,而媒体争相报道伯爵摄影师的“随军物语”,大肆宣扬和炒作其“报国”的功绩,迎合和鼓动了日本社会的战争狂热,龟井本人似乎也达到了其个人声望的顶峰。不容否定的是,无论日本如何粉饰和狡辩,都无法改变其蓄谋发动甲午战争的侵略本质。因此,长期受到封建的忠孝思想和狭隘民族主义影响的龟井,在外部刺激和内部驱动下,做出的随军“报国”之决定,绝不是其自认为的、官方与媒体口中的正义之举,只是充当了日本侵略者的仆从和帮凶。

1972年9月25日,周恩来总理在欢迎田中角荣首相宴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自从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世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21]从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奋勇反抗日本侵略的英勇斗争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惨重的代价,日本不能推卸和忘记其加害者的责任,龟井的早逝似乎印证了日本人民也是战争受害者的这一论断。养尊处优、体质柔弱的龟井在寒冷的中国东北度过了一段艰辛的日子,这使其健康受损,战争结束翌年即因旧病复发不治而亡,时年35岁。龟井之死,似乎没有引起太多社会的注意,远不及其随军“出征”时受到的关注。1896年7月21日,《东京日日新闻》在龟井去世三天后以寥寥数语报道了其“薨去”的消息,丝毫没有

提及龟井随军的“功绩”。^[22]渺小脆弱的个体在庞大的战争机器面前愈发显得微不足道,冷热分明的舆论反应更说明龟井只是用于战时舆论宣传和社会动员的工具。战争期间,日本官方和新闻媒体合谋将龟井联手塑造成战时宣传的“典型人物”,但令其意想不到的是,龟井意欲“彰显国威”的随军日记和战地照片到了今天反而成为揭露日本侵华罪行的“血证”,这不能不说是美化侵略谬行的历史反讽与审判。

注:

[1] [日]铃木健一:《民族主义和媒体》,岩波书店,1997年版,第111页。

[2] [日]美土路昌一:《明治大正史第一卷 言论篇》,朝日新闻社,1930年版,第193页。

[3][5] [日]佐谷真木人:《日清战争——“国民”的诞生》,讲谈社,2009年版,第144-146页、第149-150页。

[4] [日]大谷正:《兵士和军夫的日清战争》,有志社,2006年版,第6-8页。

[6] [日]原田敬一:《日本国民眼中的甲午战争》,戚其章、王如绘主编《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2页。

社,1995年版,第382页。

[7] 王金林《日本天皇制及其精神结构》,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2页。

[8] [9] [日]龟井兹明《从军日乘》,1899年私家版,绪言,第1-2页、第1页。

[10] [日]龟井兹明《明治二十七八年战役写真帖》,1897年私家版,小引。

[11][14][15] [日]龟井兹明《血证——甲午战争亲历记》,高永学、孙常信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6-277页、第287页、第281页、第11页、第19页、第275页。

[12] 关捷《龟井兹明〈甲午战争亲历记〉之研究》,戚其章、王如绘主编《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0页。

[13] [日]市川荣梨《从日清战争的照片上看战争形象与意义》,《东亚文化交涉研究》(年刊)2014年,第167页。

[16][17][18][19][22] [日]新闻集成明治编年史编撰会《新闻集成明治编年史·第9卷》,林泉社,1940年版,第159页、第188页、第192页、第192-193页、第432页。

[20] [法]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87-91页。

[21] 《人民日报》,1972年9月26日,转引自贾丹《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的历史评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6期第81页。

[责任编辑: 郭 祥]

Japan's Public Mobilization and Wartime Propaganda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In the Case of Military Photographer Kamei Koreaki

Ma Buyun XingYongfeng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public mobilization and wartime propaganda had been widely carried out in Japa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external stimulus and internal drive, Kamei Koreaki applied for permission to become a military photographer and came to China twice in wartime. His application catered to the need of public propaganda and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and media produced Kamei as a hot topic for the guidance of public opinion. However, what should be pointed out is that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is the war of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which was deliberately launched by Japan, and consequently Kamei's act of serving the country as a military photographer can not be viewed as a righteous act, but the manner of a minion and accomplice of the Japanese aggressors.

Keywords: Kamei Koreaki;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Public Mobilization; Wartime Propaganda

Author: Ma Buyun , Ph. D. Candidate ,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 Shandong University , Jinan , 250100; Xing Yongfeng , Professor ,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 Shandong University , Jinan , 250100

中日甲午戦争における日本の輿論動員と戦時宣伝 ——従軍カメラマン亀井茲明をケースとして

馬歩云 邢永鳳

要旨: 中日甲午戦争(日清戦争)において、日本は広範囲にわたって輿論動員と戦時宣伝を行ってきた。外部の刺激と内部の駆動を受けた亀井茲明は従軍カメラマンの申請書を提出し、のちに日本侵略軍とともに二回にわたり中国に来たのである。亀井の申請は戦時宣伝の需要に迎合したもので、日本政府とメディアは共謀して伯爵従軍という事件を宣伝用のホットピックに作り上げたのである。だが指摘すべきなのは、中日甲午戦争は日本がかねてから企んで挑発した侵略戦争であり、亀井の従軍が決して彼が思ったような、そして日本のメディアに宣伝されたような正義の行動ではなく、ただ侵略者の従僕と共犯者を務めていたのみである。

キーワード: 亀井茲明、中日甲午戦争、輿論動員、戦時宣伝

作者プロフィール: 馬歩雲、山東大学外国語学院博士後期課程、済南、250100; 邢永鳳、山東大学外国語学院教授、済南、250100

갑오전쟁기간 일본의 여론동원과 전쟁시기 홍보 ——종군촬영사 카메이 지메이를 예로

마보운 형영봉 (馬歩云 邢永鳳)

요점: 중일갑오전쟁기간 일본은 여론 동원과 전쟁시기 홍보를 많이 진행하였다.외부자극과 내부 추동으로 인해 카메이 지메이는 종군촬영사가 되려는 신청을 제출했고 일본침략군을 따라 두번 중국에 왔었다. 카메이 지메이의 신청은 일본 여론에 필요했고 일본은 백작이 종군한 사실을 전쟁시기 홍보의 주관심사로 만들었다.지적해야할바는 갑오전쟁은 일본이 계략적으로 발동한 침략전쟁이다. 카메이 지메이의 종군은 홍보의 정의가 아니라 침략자의 노예와 공범자의 역을 담당했을 뿐이다.

키워드: 카메이 지메이,갑오전쟁,여론동원,전시홍보

작가소개: 마보운,산동대학외국어학원박사, 지난, 250100; 형영봉,산동대학외국어학원 교수, 지난, 250100